



文明之阶

Wenming Zhi Jie

权利与责任、自由与约束、法治与礼治、民主与圣贤，皆质与文、真与善、霸与王、实然与应然之别。

樊宇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谨以此书献给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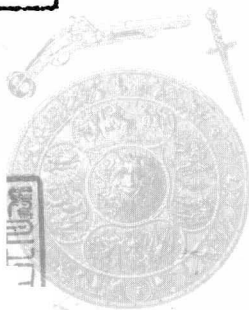
文明之阶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Wenming Zhi Jie

樊宇 ●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之阶/樊宇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430-6532-1

I. ①文… II. ①樊… III. ①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7225 号

著 者:樊 宇

责任编辑:梁 杰 刘棣辉

封面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湖北荆州市金山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9 字 数:286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导 言

人类历经数百万年演化脱离于自然之境，进入文明，得益于智力的启蒙。人初时与动物无异，皆知行合一，因离知于行，渐渐开智。这种质变以怎样的历程得之？它是一个反乎本能的过程，是弱化自然竞争性的过程。人在自然的约束中求自由与权利，渐获解放，最终挣脱了食物链，俯瞰众生。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同时也是危险的时刻，因自然界生灵失去了对人类的竞争性。此时，进入人为境域的人类，即应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及自订行为规范而融入自然。人类走到了一个岔路口。中西方文化历程自此而殊途。西方仍依积习沿着张自由争权利的路数走去，所异者古代以集团为载体，现代下委到个人，终致盲人瞎马，夜半临池的危局。盖人类的智力突进固然由知行分离，弱化本能而得；然本能者具稳定性、先天性，可弱之而不可去；智力又回过头来迎合、强化本能而生出人欲，重现知行合一之势。竞争遂在同类之间展开，造成强凌弱众暴寡的局面。在这个阶段再以自由、权利为本位便不合时宜，而应转由在自由中求约束的价值取向。华夏民族往圣先贤早觉于此，适时推出修身自律观念和责任本位，由前一阶段的离知于行进而离情于欲，由《礼记》推出天理人欲之辩，去人欲之争，尚辞让，夺其势而归于情，寻人类之间的同体之情。西方天理人欲混沌未分，宗教时代误将天理判归人欲而禁欲；余则将人欲等之于天理而纵欲，造成近、现代的器物大跃进，势成早熟，今颓势已现。

医学界对癌症曾流传：是癌治不好，治好不是癌。援此说用于西方政体则有：民主不可实现，实现的不是民主。癌的不治说具时效性，今已被突破；民主不可能说？则无时效之虞。卢梭即说真正的民主永远不会有，因其违反自然秩序；达尔则认定它是少数人的统治。西式民主系由物力竞争求平等而得。西方思想资源如自

由、权利、竞争、民主、法制，华夏如责任、孝悌、礼、仁、义、太平等，两种观念体彼此相背离，而平等观念即成为中西方思想的交汇点。西方古代有位者兼摄财与德，现代则有财者兼摄位与德；华夏民族三代之时有位者应有德，经孔子移步换形为有德者应有位。为何现代西方求民主而不得，由少数富人得贵于人、主宰了政治呢？自然万物其生成为参差不齐，人类则有智愚贤不肖，杰出者为少数。如何将少数杰出者安排到高位，即应成为人类的制度设计之大衡。政治亦不例外。且政治家，一定程度的资源集中势所难免。民主制因违背自然秩序故求平等而不得，因而其理想属形式平等。华夏礼制重质不重量，尊德尚贤。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孟子曰：唯仁者宜在高位。顺应着人类自然生成的不齐而成就了实质平等，使人因智愚贤不肖而各安其位，即《尚书》所曰“唯齐非齐”。西方的权力分立制衡其稳定性、抑恶之效亦不容否定，然其以性恶为出发点，专在“防”字上用力，具有消极意义。其长于抑恶拙于扬善，如单腿跛行，扬善的欠缺必拖累抑恶，故此制度设计立意较低。华夏政治重人文道德教化，兼顾扬善与抑恶，尤以扬善为重心。选举政治使参政者为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政治沦为党争、利益方的博弈，彼此拉拽在一起不能动弹，无余力兼顾道义；它关心的是当下利益，执政者与继任间缺乏连续性。华夏圣贤政治修身蓄德，为政者超迈于利益团体，而以道义天下为己任。当今的中国政治即继承了这一传统，并能使短期目标与远景目标结合起来，政策连续性不因换届而中断。

礼制为差序梯形结构，法制则平面体。法欲求其效力抵达每一个人，故价值设定即就低不就高，符合木桶定理。加上法的功利竞争性，使价值层级低矮，趋于世俗化。礼则以人禽、文野、义利、君子小人之辩建立价值位阶，引导人心所向，化俗清伦。华夏民族人与人关系重人伦家庭，故以礼调节；西方习于集团性生活，故以法律之。现代契约自由须缔约人地位平等，因而法律重心落在商事上。礼为有情界，法则无情界，以免干扰理性计较，故礼与法之别亦为情与法之异。法不容情，情却容法，将法兼容并蓄于礼制，使之获有机调和。礼制私域讲情，公域讲义，使无情者不得尽其

辞。义的观念容情不容私，法则容私不容情，法的讼争使无情者得尽其辞。礼制对君子律之以“耻之”，对小人律之以“痛之”，使民敦厚作让；法则“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黄梨洲曰：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中。柏拉图亦曰：如砍九头蛇头。今之法制去价值化、程序化，铸造出适应商业化社会的理性人、职业经理人；礼则亲亲、尊尊、贤贤。现代法制与战国时的法家本质上并无不同。皆遗礼义，弃仁恩，尚事功，在小体上用功；所异者一则麻醉无痛感，一则戕贼有痛感而已。荀子曰：“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故有治人而有治礼，有治礼而有治法、治世。继承礼乐精神，重建价值层级，实乃当今中国之急务。

中国是否应该追求富强之道？西方对财富的追逐系从中世纪禁欲之痛中逆势疾驰而来，要揽天下资源以为己用，追求大富无止歇，其福利社会欲永浴安乐，其实祸患即隐伏其中。自然界生灵皆生存于忧患之中，少有隔夜储粮，这样的忧愁患害激发了它们的活力和强健的适应力；人类社会亦然，其道理在安与忧、足与不足之间。西式富裕是一种极端制度，其生活无忧无虑日，亦即活力停滞时。故孟子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中国当求取小康小富式生活，小富则安，大富不安。此固有势不容物不赡的考量，然重要的是追求大富非人间正道。以中产阶级为社会中坚，属西式财力社会的特征，当归于有恒产遂有恒心之列；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流品观防止了财力社会的出现，故今日中国当建立以无恒产有恒心的士君子为中坚的社会。西方行事逻辑溯古至今皆为：弱则图强，强则必霸，未霸只因未强；自胜者强则为中国古典价值观，以修身养性、去除偏执迷蔽求得，处理国际关系以宽柔仁厚待人。世人皆言道德，然中西方道德观在性质、内涵上迥异。西方力量为德，中国德为力量；西方以自然为正当，以武德争天下；中国则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以文德平天下。华夏民族大事小以礼仁，以人道合乎天道而保天下安平；今西方强大者事弱小者以智与力，因悖逆自然而致世界秩序紊乱。如孔子所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礼记》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西方宗教时代则有传教传统，今以自由民主价值观挟器物坚利之优势，迸发出不可遏制的传

教热忱，对异质文明实施着大规模杀伤。礼不往教原则为往古圣贤通达澄澈的识见，往教非礼，强卖则无礼。中国当传播此原则，使世人认识它的清明高远，以其作为衡量文明与否的试金石。中国的复兴当定位于文化；如追求富强，则往古未曾走入富强歧途，何复兴之有？今日的中国器物进步其势迅疾，制度与观念则相对薄弱。然不破不立，随破随立，拨乱始可反正。

西方艺术以求真贯乎其历程，古时的肖像画其逼真的效果非其他地区可企及，至文艺复兴进而有解剖术，又发明照相术，使对真理的探索抵达顶峰。现代派另觅出路，以具像艺术为非真，开辟了抽象艺术，似追求柏拉图式的理念，揭示事物的本真。有别于西方真与非真之辩，华夏艺术则为技与道之别，因而在真与非真上均不及西方。庄子有物之精粗之分，物之粗疏可描摹，物之精髓则意致，于是有了工笔与写意之别。西方艺术由自然主义占上风，古有酒神精神，今则第一信号，拥抱市场，使艺术融于生活。华夏艺术由礼乐精神主导，致中和，斥溺音，发情止礼。艺术重求善，游于艺须据德依仁，文以载道。然乐的一支未得传承，实乃至憾！而西方巴洛克音乐则风景独好，达到了文与质彬彬然的高度。西方艺术喜好宏大叙事，尤以表现英雄的征战、凯旋为永恒的题材，因而有主客观的对待。古时面对自然的威压，要赋人伟力以求平衡，故艺术聚焦于人体上；随着近代科学对自然的去魅，人本主义实现，艺术家始将注意力投射到自然风景中。中国艺术重抒情，柔美幽婉，通过情景合一实现物我的融合。

西方观念、制度皆落于器物；中国器物、制度皆落于观念。以真、善、美喻于中西方之别，西方属真的善，中国属善的真；西方艺术为真的美，中国为善的美。

目 录

导 言/1

引子：谁来给猫挂铃铛？ /1

第一章 力与德/7

第一节 英雄与圣贤/7

第二节 扩展物力与扩展同情/22

第三节 有对有为与无对无为/28

第四节 性恶与性善/38

第二章 齐与不齐/51

第一节 位统的齐与不齐/51

第二节 财统的齐与不齐/68

一、变异的民主/68

二、民主有限的实现/75

三、民主制属于次级文明/79

1. 西方理想中的民主制悖逆自然秩序/79

2. 民主制属于物量定夺机制/81

3. 民主制同而不和/82

4. 民主制陷人类于世俗化/84

第三节 德统的齐与不齐/85

第三章 法治与礼治/103

第一节 因伦理异旨而殊途/103

- 第二节 主俗与主雅/115
- 第三节 竞争与谦和/125
- 第四节 冷漠机械与温润有机/133

第四章 极端与中道/141

- 第一节 自由与约束/142
- 第二节 政教的合一与分离/154
- 第三节 大富与小富/166

第五章 富强与被富强/181

- 第一节 迥异的富强观/181
- 第二节 守经与通权/186
- 第三节 霸道与王道/195
 - 一、王者无外,怀柔远人/203
 - 二、大事小以仁,强事弱以礼/209
 - 三、礼不往教/215
 - 四、厚往薄来/219

第六章 实然与应然/223

- 第一节 权利本位与责任本位/228
- 第二节 世俗化与化世俗/240
- 第三节 真、善、美/259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

引子：谁来给猫挂铃铛？

本人年近五十，人生过半，头脑灵活又果断，因而达到了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准：有房有车，经常有饭局，每餐必有酒肉，银行账户有不菲的存款，生活节奏快。我应该意识到我的社会地位已大幅提高。依照民主制度的价值观，中产阶级是社会中坚。时代在这时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小富即安心理要遭舆论、朋友嘲笑。但事实是我丧失了向前冲的动力。有车后我的腹部开始隆起，曾经引为自豪的六块腹肌早已成为回忆，腰上长了一圈赘肉，游泳时就像戴了一个救生圈，因此我放弃了游泳。我的体能下降了，步行一小会儿就喘。城市空气中悬浮有阴霾，我得了支气管炎，咳起来有肺音。我的精神面貌也出了麻烦，对外界的好奇心减退，对各种商业化刺激木然以对，常常发呆。何药可医我的病状？大而言之，任何国家的经济出了问题，药方是市场化不够；政治出了问题，则为民主化不够。于是我开始找了些这方面的西方著作读。《雨王亨德森》书中的雨王在书中发现了美钞，我什么都没发现。我又翻了翻儒家、道家经典，感觉圣人与此时的时代现状格格不入。中体西用已被学界否定。我决定离开城市，到大山里去旅行。至少山里的新鲜空气对肺部有好处。我驾车沿着盘山公路上了山，遇到熙熙攘攘的游人；我于是背了行囊，步行朝山的深处走去，直到腿脚酸软了，我便哼起“爱拼才会赢”这首歌自娱。前面树林中有几棵巨大的树，走近一看，是银杏树，其中一棵数人才可合抱的树上坐着一位老者。我走到树下讨水喝，老者示

意我上去。我抓着绳梯往上攀，登到中途便后悔了，只得硬着头皮继续。等我终于坐到老者对面一个粗大的树杈上时，我松了口气，接过他递给我的银杏茶。我一面呷着茶水，一面端详老者红润的脸颊，飘逸的胡须，心中暗暗称奇：这大概就是老子所说的不出户，知天下的那种人。果真如此，也不枉此行。我于是便天南海北地与之攀谈起来。不一会儿，我对他有了好感。他语气温和舒缓，双眸深邃，具有一种催眠的魔力……

灾难终于降临了，一个紧接着一个。他这句话把我从梦幻中唤醒。什么灾难？他说：自然灾害频发，生物链紊乱，淡水紧缺，河流污染，新型传染病肆虐，城市被阴霾笼罩，天空呈暗灰色。几十年内地球人口减少了数十亿。老者没有理会我的笑意，接着说：化石燃料排放使气候变暖，工业废水、垃圾污染了河流，反常的热量诱发病菌的繁殖，使大量生物灭绝，尤其是脊椎动物。蚊子变异后传播新型脑炎给人类。干旱，湿地消失，台风频仍；淡水越来越稀缺，农田灌溉和人畜饮用已无法兼顾。尽管天上下的已是酸雨，但是雨水的收集日益重要。催雨、收集雨水的科技产品热销。核电站因疏于管理、技术原因和地震而频现核泄漏，切尔诺贝利级的核事故几度重演。由于海平面的上升，许多岛屿已消失，加上遍布世界的核废料、因战争产生的贫铀弹区，使可居住面积大为减少。人类为争夺水源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战争。克隆技术、基因技术大行其道。许多城区人类已丧失一半的控制权，另一半城区被野生动物和失散的圈养动物占领。但人类的主要对手是蟑螂和老鼠。经异化、改进后的蟑螂已具备短距离飞行能力，且个头儿变大。这时人类的智力上的优势显示出来，挑起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为了争夺对人类的寄生权，蟑螂与老鼠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老者面容严峻，我不宜把他的一番奇谈当做某种灾难小说来听。我说，人类很多年前就已采取环保措施，你说的灾难已可以避免。老者指着树下的一个水塘说，水塘中央有一株水葫芦，水葫芦的繁殖以每天一倍的速度增加，第二十九天时，它覆盖了一半的水面。次日，你会发现整个水面已被它占满，水中的鱼虾就会因缺氧而死亡。人类在长期的演化中，一如其他飞潜动植，其活动对自然

产生的是微创，大自然可在短时期内恢复。工业革命后三百年，人类对大自然的打击其深度和广度空前，大大超过了自然的恢复节律，于是水葫芦效应显现，人类的生存进入倒计时。而人类对此或浑然不知，或不愿相信。起初，环保人士就曾被视为环境恐怖主义者，被扣上借此推销环保产品盈利的帽子。过了一段时间，发达国家环保意识渐浓，于是有了《京都议定书》。生态保护本身是一项责任，对污染、破坏的恢复其功在当代，其效在后代，是一项长期的、非盈利的事业。而未被污染破坏的地区最明智的环保就是人类不要染指，不作为即可。但由于当今世界是一个商业世界，属于权利本位，商业思维主宰了议定过程，即必须签订一个能盈利的环保协议。当然，此议定书对环保亦有所助益，但进度太慢，赶不上污染的速度。这样一来，环保与否就如五十步笑百步。尽管如此，该议定书还未能如期生效。欧盟由于环保技术占优势，可通过碳排放交易赚钱，于是欣然签署。美、俄由于环保技术不如欧洲，无利可图，无竞争优势，故拒签。后来俄罗斯争得了大量剩余减排额度，有利可图后才签字画押。在这个一切皆可成为商品的世界，《京都议定书》当然也不能幸免，它也成了贸易协议。其实从时间上看，当年西方列强掘第一桶金即源于海盗、劫掠、贩奴、种族灭绝。所以，如今为了人类生存的最低目标（而非崇高理想）而回赠给被侵害国以环保技术、提供物质帮助，亦符合商品交易的“等价原则”，且绝无亏本之虞，还可赎罪，没准还可成为上帝的选民。可西方觉得划不来。美国断然拒绝了该议定书，理由是履行该议定书将损害国家经济利益。后因自然灾害，保险业受损，美国保险业遂给企业施加压力，民众的环保意识亦觉醒，为了公共形象，同时也意识到若不发展环保技术及清洁能源，将遭受更大损失。于是企业也开始了一定程度的环保行动。可见在发达国家的博弈中，谋利为第一选项，环保沦为第二。

由于资本主义周期性震荡，经济危机出现时，高物质享受、高福利制度面临威胁。谁动了我的奶酪？民众此时对环保措施感到苛刻、不快。执政者为了支持率，候选人为了选票，不得不把经济增长放到首位，从而使环保政策走向松懈，致使环保事业出现反复

和倒退。市场化的基本特征是消费主义，于是刺激消费即成为各国的基本经济策略，然而人类的红利即地球的赤字，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把商品推销到全世界，西方为此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于是便有了全球化。在资本与环保全球化的进程中，南北矛盾未能有效调和。仅占全球人口 25% 的北方国家消耗着全球 70% 以上的能源，又把环保变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向南方国家转让环保技术和提供资金援助时斤斤计较，或口惠而实不至。南方落后国家则更加理直气壮地发展经济。民族国家的形态则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竞争，美国要军事和经济双重霸权，欧洲要经济、话语、价值观方面的柔性霸权。竞争迟滞了环保。苏珊·乔治说：“永远不要指望跨国公司和富裕国家在最终意识到他们的行为会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能及时收手。在我看来，即使他们为了自己子孙后代的将来考虑，想有所收敛，也是身不由己。”（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反资本主义宣言》）将环保寄望于科技？你该知道 DDT 被禁用的事情，任何一项科技成果都有副作用，只不过当时人的认知能力意识不到而已。仅靠科技克服环境污染是远远不够的。恩格斯说，人类对自然的每一个胜利，都会遭受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恩格斯所处的年代是资本主义初期，现在则到了它的晚期。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能力空前提高，自然则还给人类一系列深度打击，过去的隔世报变成了现世报，人类深切体会到了老子那句名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我自然无法否认老者描述的灾难的可能性，而且也有兴趣继续听他的论说。我说，你毕竟不应该对人类过于悲观，既然人类自古到今有如此的成就，理应有处理危机的应变力。老者说，现今的世界被西方主导；在长期处于劣势后，西方人靠强力取得了三百年的优势，他们一定会依凭此术紧攥不松手，从他们动辄抛出历史终结论即可见一斑。虽然西方亦多有有识之士诟病其制度，但正如苏珊·乔治所说，“想有所收敛，也是身不由己”。其商业化加民主化加控制欲导致西方只顾眼皮底下的利益，就像青蛙被放进烧杯，最初的警觉很快被适宜的水温消除，遂尽情享受，当水温过高想离开时，因无力脱身，终被烫死。如甘地所说，我们父辈认为是奢侈

的东西已变成我们这一代的必需品。西方人已习惯于奢侈为必需，并推销其生活方式，虽然亦发觉环境问题，然始则察焉，继则安焉。黑格尔认为别的民族未自觉，西方人已自觉。他所说的西方人的自觉若指从宗教神权的束缚中摆脱了出来的话，是不错的；但他的自觉是燃烧着欲望的进步观，莫基于财产之上的权利观，拿孟子的话说是陷溺其心。故西方人虽从神权独擅中醒来，随即又昏昏睡去。就这样，西方引领着人类在商业化的物质追逐中或者将危难尽量拖延给后代，或者是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使人类成为第一个罔顾子孙后代的物种。我当然对人类仍抱希望，我寄望于中国和印度的自觉和对传统价值的继承，毕竟历史上的中国以礼乐治天下，印度则为宗教万花筒。这两个民族代表着人类的高级文明。

罔顾子孙说着实振聋发聩，不过西方的科技亦不容一笔抹杀，它毕竟给人类带来物质利益，我说。老者说，这正是可叹之处，何以如此灿烂的物质文明会使人类濒临绝境？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或许本该三万年、三十万年才应渐次实现的物质文明，人类在区区三百年就已实现。这种社会形态生成了诸如比尔·盖茨那样的其财富比五十个最贫穷国家财富的总和还多的畸形情状，而且其制度与观念还在鼓励大家向他看齐。对这样的情状人类要做的就不是讴歌它，而是铲除它。再如生物的生存样态呈金字塔状，在食物链的供给上，低一级的生物仅有 10% 的能量转移至高一级生物，由草而羊而虎，位于高端的虎其数量便有限，即自然生态只能供养位于金字塔顶端老虎以少量的数目。人类并无如狮虎那般的利齿锐爪，自然生理形成的体态、牙齿、消化系统决定其应为素食类型，如食肉动物的胃酸是人类的二十倍。人类已成功地从自然规律中获得了极大解放。十八世纪的欧洲人认为食肉者有教养、高贵，食素者懒惰、低贱，这样一来“高贵”者数量剧增。地球上 93% 的森林砍伐与食肉有关。如所有人类皆变为食肉型，需要十四个地球的支持。为了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肉食需求，人类实施了禽兽的工业化圈养，但大量的圈养成了瘟疫的生发源，对付瘟疫的措施是一次次的大屠杀。这种与自然节律背道而驰的生活方式必遭报应，自

然的报复则频度加快，并带有为被侵害、灭绝的生灵主持公道的意味，以恢复正常的生态秩序。顾亭林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辩，今已无此区别，俱由肉食者谋之矣。

太史公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今天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人与人之间则尊市场经济而罕言义，皆役于物，心灵陷溺其中而习焉不察。人类的现状正如老鼠们计划给猫脖子挂铃铛，起预警作用，但此计谋因缺乏操作性而流产。人类要保护生态已如前述无可操作性，自身已无力给猫挂铃铛，最后由外力——摧枯拉朽的大自然挂了铃铛。

既然大自然出手摧毁了市场经济，人类就不必喋喋不休地争论了，实行计划经济好了，我说。老者说，不，是摧毁了商品社会。我说，发思未来之幽情，子孙们的日子恐怕要艰难些了。老者说，今天的必需品成了后代们的奢侈品；今天的时装翻新被这样的顺口溜取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说，你说现今的商品化、权利本位、消费主义、技术崇拜及争强斗霸皆陷溺心志，其理似不谬；但我注意到你把民主制度也框了进来，这我断断不敢苟同。民主制是普世性的。老者说，我反问一句，你前述的诸条皆属陷溺其心者，至于民主制，独无所同然乎？“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庄子·骈拇》）此非瞻前顾后，长虑深究不足以辨。容我追根溯源，对照东西，始谈得上拨乱反正。我说，愿闻其详；可是我不得不说，上述情形皆为或然性，而非必然，未免耸人听闻。老者说，或然中包含必然，一旦一语成谶，则倾巢之下无完卵矣。你的必然指涉自然灾害的外力毁灭，我的则包括人类的自我毁灭。其现象为外力施加，实质则源于自我戕贼。人本源于大自然，今人与之对峙，对抗自然即对抗自己，人类的行为一步步化丰饶为枯竭，复魅的任务重之又重啊。

以下各章节除我间或提几个问题之外，皆为老者的叙述。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
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

第一章 力与德

第一节 英雄与圣贤

西方自古以来有崇尚英雄的集体意识，以孔武有力，气魄傲人的豪杰为楷模。在古希腊的氏族生存样态中，城邦之间征战频仍，时代呼唤膂力过人者的出现。因而勇士应运而生，并形成了谱系。他们追随欲望的驱动，尊奉生存法则，成王败寇，只臣服于命运的安排，怀有浓重的宿命观念。他们不受是非善恶的约束；或者说勇本身即为善。在流传下来的荷马史诗、希腊神话等文艺作品中皆可得到这样的描述，更不用说斯巴达的军事集团和亚历山大的远征了。出于在力量上突破自然约束的渴望，希腊神话中的神被塑造成人的体型，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力，且多神共存，具有亦神亦人的特征。神与人一样常处于交战状态。神固然高于人，但神人交通常常是形上服务于形下。卢梭在评价荷马史诗时即说“倒是神在为人而作战”。（《社会契约论》）无论氏族中的人还是信仰中的神，人伦观念均淡薄。古希腊的雕塑艺术颇为闻名，其艺术表现以塑造人物为主，采取写实主义手法。男性雕塑给人以突出印象的是健硕的身体和发达的肌肉，体现出强烈的力量之美；女性如雅典娜则右手持长枪，左手持盾。骁勇精神的被推崇是由于城邦之间、民族之间及异教的神之间常处于交战状态，或攻城略地，或

以暴御暴。交战过频即需要休养生息，于是出现了休战期的约定，奥林匹克运动的和平竞争对交战各方即起着缓冲作用。伯里克利执政后通过立法确定了军人在城邦的主要地位。这样一段话反映了希腊人对战争的观念，“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自然艺术，因为它包括狩猎；它又是一门用来对付野兽和那些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愿服从命运安排的人的艺术。这种战争当然是正义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将对人的战争等同于狩猎，表明其时的希腊未脱离石器时代的丛林法则，并将异类因自然形成的等级成功移植到同类。战争依然是生存的常态，是自然正义。亚历山大结束了希腊的军事联盟制，他的恢宏的抱负是复仇，“使东方和西方间的古来仇恨和敌意一决雌雄。”（黑格尔《历史哲学》）“复仇”成为连接东西方关系的一个关键词而长存于历史，并被不断演绎到今天。西方英雄主义的施展以劳师远征范围其经纬度，这种远征意识在罗马时期被发展到了极致。“罗马”二字即为希腊文的“强力”，“在罗马开国之初的那个劫掠时期内，因为国家的基础建筑在战争上面，所以每一个公民必然是一个军人。”（黑格尔《历史哲学》）罗马建立在奴隶制的非自给自足的商品经济之中，因此战争成了维持它繁荣和奢靡的常态。罗马军人由于被灌输了罗马人天生是别的民族的主人的观念，所以在残酷的战争中常常能获得最终胜利。伽图在罗马元老院每次会议后常念叨的那句名言：“迦太基非灭掉不可”，今天想起来仍然杀气腾腾。爱国主义和恃强斗狠精神使罗马人冷酷无情，厚重、粗厉的时代品质使有机体趋于机械化。“在坎奈之役战败后，罗马人甚至不允许妇女们流泪”，“罗马城市没有商业，又几乎没有工业，每个人要想发财致富，除了打劫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城市公共生活亦型塑着自由民精神，著名的竞技场上演的血腥格斗可持续百日，奴隶、战俘与死刑犯互相搏斗，至死方休。为吸引观众，野兽也被驱赶上场。这种娱乐是凝聚民心的好办法，因此竞技场延续了数百年，在宏大的格斗场面上，观众决定场上格斗士的生死。这种民粹主义的参与模式，旨在不停地熏陶罗马的英雄意识。罗马时期造就了苏拉、庞培、恺撒、奥古斯都等英雄，他们的征战极大地